

陈树年

# 中西编结合的成功探索

——评《文献编目教程》

文献编目,在各类图书馆中都是主要业务工作之一,我国高等院校图书馆学专业都将之列自己的核心课程。1983年我国颁布《文献著录总则》以后,原有的《图书馆目录》等教材与此相适应都做了重大修订,并陆续新编一批以标准著录为基础的专著或教材,如黄俊贵、罗健雄编著的《新编图书馆目录》,李纪有、余惠芳编著的《图书馆目录》,傅椿徽主编的《图书馆文献编目》,谢宗昭主编的《文献编目概论》等。1985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出版了《西文文献著录条例》,该条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遵循ISBD和AACR2的模式,并对此做了必要的删节和修改。《条例》的出版对我国西文文献著录工作起到了统一和规范的作用。此后,夏勇、周子荣编著的《西文编目实用教程》,段明莲、关懿娴编著的《西文文献编目》等相继出版。这些标准、教材的问世,使我国图书馆学文献编目的教学走上了标准化和规范化的道路。但在我国长期的教学中“中编”和“西编”却始终是分成两块或实行两步走的。

1996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李晓新、杨玉麟、李建军编著,钟守真审定的《文献编目教程》(以下简称《教程》),突破了现有教材的模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教程》最大的特点就是“中西合璧”,正如来新夏教授在序言中指出的,“长期以来,中西文籍,各成体系,以致基本原理与内容往往有重复者,于是探求新知者在实践中进而以文献编目之名涵盖中外。此不仅为初学者减少头绪,亦为使用者提供方便。”关于“中

编”与“西编”是否能“合二而一”的讨论已持续很久。1989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西文编目教学研讨会上,专家们的意见可归纳成三种:一是两本书,分别教学;二是一本书,分段教学;三是将中西编有机地融合起来(这是少数派的意见,李晓新、杨玉麟便是其中两位)。中西编分别教学,其中理论、技术方法部分颇多重复,这已是大家的共识,然而一说到“合”,问题就出来了:著录的语种不同、读者检索点选取的习惯不同,“主要款目”的纠缠亦是少不了的。《教程》的编者认为,编目理论与技术的发展,始终是与信息记录和传播的形式、检索手段和方式、印刷复制技术的进步相适应的,是时代的产物。如果说纯手工编目时代款目的“详”和“简”与编目效率相关,那么在当今现代印刷复印技术普遍应用、联合编目及联机编目广为使用的时代,已没有人再去花费时间区分“详”与“简”,通用款目可以为任何款目提供必要的书目数据。至于“根查”,可按各自的习惯记录在相应款目上。在机读书目数据中,一条记录包含某一文献全部的书目信息和检索点,区分款目的类型和性质已失去意义。基于这种考虑,编者大胆地将中编与西编的教学融为一体,在讲授著录技术各章节时,一条规则之下同时说明中西文献的著录方法,如在讲解分担责任者著录方法时举例:

西文文献编目/王作梅,严一桥编著

The anatomy of mathematics/R. B. Kershner, L. R. Wilcox  
这样不但略去不必要的重复,还便于学生通

过比较其异同，加深对著录规则的理解。

“主要款目”的确定和标目的选取，是中西文编目中不可回避的差异，编者在《教程》中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讲清了“主要款目”在中西文编目中是用不同的划分标准形成的概念；其次通过“存废”的讨论让学生了解款目类型的演变和西文文献编目中“主要款目”的意义；第三是根据中西文编目的差异，采取“大合而小分”的方法，分别讲授“中文文献著录标的选取”和“西文文献著录标的选取”，这样既求了大同，又顾及了小异。

《教程》的编者敢为人先，在充分论证的前提下大胆探索，为我国文献编目教材的编写和教学闯出了一条新路子。

《教程》除有上述突破之外，还有不少新特点，主要体现在：

第一，结构安排上更趋合理。编目教材的编写，通常将理论（绪论）及历史部分置于教材之首，即先理论后实践的顺序，而《教程》以“文献编目概述”为开端，率编目技术各章于前，再依次序列“计算机编目”、“图书馆目录概述”、“文献编目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等，自成体系。这种独具匠心的安排，一是试图以“文献—著录—款目—目录—目录体系”，即由微观到宏观、由具体到抽象的次序引导学生一步步认识和深入理解文献目录；二是让学生直接进入编目实践的主题，提高学习的兴趣，将学生不易掌握的理论部分及兴趣不大的编目史部分移到后面，避免了以往那种尚不知编目为何物却先要学历史的弊端。

第二，实用性好，便于学生学习。《教程》遵循《文献编目基础教学大纲》关于“通过大量的练习，学生应能熟练地运用文献著录规则，掌握目录组织方法，具备从事文献编目工作的能力”的要求，突出编目技术方法的实践性。著录规则的阐述均辅以典型的著录实例，融技术于实践之中。每章之后均附有思考题和参考文献，便于学生把握重点，通过参考文献的引导进一步深入学习。编者还按教学的

进度，精心搜集了 50 多例有代表性的中西文著录实习题附于书后，为学生边学边练，在实践中综合运用著录规则，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因此，《教程》不仅对在校学生是一本实用的教材，对实际编目工作者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除此之外，《教程》另一重要特色是在编写中注重反映国内外最新编目理论成果及应用技术，结构严谨、文字精炼。

当然，作为一部具有开拓性的教材，不会是十全十美的，其中有一些安排可以推敲，如《教程》加入了“计算机编目”一章，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也是适应传统专业课向自动化改革的需要。但在内容安排上显得偏薄，距《教学大纲》的“学会使用标准的编目软件检索、录入、修改、打印编目数据，具备从事中、西文计算机编目工作的能力”的要求有一定的距离。且这一章的内容与《计算机应用》课相叠，在这里只起到一个衔接作用。如何处理好这两门课的关系，还需在教学实践中进一步探讨。《教程》是否需附中外主要出版社名录，也值得商榷，因为对编目工作者来说虽然需要，但又不够（有专门的工具书），对于学习著录方法来说，则作用不大。

综观全书的编写，既全面贯彻了《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又有较高的创新性。较好地解决了中西编结合上的难题，通过对不同语种的文献编目理论、方法和历史的分析比较，既阐明编目实践中所运用的具体原理和方法，又从理论的高度概括了文献编目事业日趋进步的实质和意义，不失为一本具有探索性的好教材。

陈树年 宝鸡市图书馆研究馆员，《中图法》副主编，《图书馆和情报机构系列工具书》主编，国际知识组织学会成员。通讯地址：陕西宝鸡市滨河路 1 号。邮编 721000。

（来稿时间：1997.3.10。编发者：徐苇）